



吳橋

與林文月教授談「傳記文學」

林文月女士，年輕的臺大中文系教授。當她引我走入書房時，桌上放着幾本古今名人傳記，和一本她正在翻譯的日本古典文學鉅著「源氏物語」。這幾本書正反映了近年來，她業餘時間的主要兩項工作：翻譯和傳記寫作。

「傳記文學，可以說是比較嚴謹的小說。」她說

談話開始，她能很迅速地進入主題，她安閑地靠

在椅背上，雙肩絕不前傾，眼睛靜靜地注視着你。她的話語有時會稍微停頓，這時眼光的焦點會略略地收縮，似向內搜尋更為清晰的資料。

「傳記的寫作態度通常有兩種，」她說，

「一種是緊握住文獻的作法，史料記載些什麼，今人就開口說什麼，基本目的只是為古事作新注，將官式記錄散文化即可，是以平實作為理想，以徵信作為目標；另外一種，則是摻揉歷史與文學的作法，資料上只告訴了後人事件的因和果，我們就要將邏輯的

推理和想像力，填充進這些間隙裏去，又是以生動作爲理想，以可讀作爲目標。」

她認爲，前者走的是學術路線，這樣的作品，適宜作爲課堂上的補充教材，在對個別人物作專門研究時，可以提供知識上的需求。可是，對於一般讀者而言，可能對不上他們的胃口。後者，却能使傳記中的角色更形象化，生平更情節化，而主人翁的內心中，屬於非常隱密、非常個別的喜怒哀樂等情緒，也能藉着傳記作者的揣度與同情，又重新甦活於紙面上。當然，想像力的運用也必須有個節制，才不致又流於演義體般的散漫。

她的椅子是可以轉動搖擺的那種，但我注意到她始終不會些微地挪動，甚至我將問題的重心，牽引到她的作品上時。

去年暑假，她完成了「謝靈運」這本傳記，有十一萬字；今年暑假，她又寫完了「連雅堂傳」，有十一萬六千多字。

兩年前，河洛出版社有一個構想，將中國歷代的文學家、史學家、思想家等等，個別作一串有系統的

介紹，邀請恰當的學者分頭撰寫，其中當然不能缺少謝靈運。她在碩士班時的論文，便是對謝靈運的研究；在臺大開的課，也是以謝詩爲中心。資料的彙集、整理，自然比別人要來得完備與便利；更重要的，多年來讀謝、教謝、透視謝，也早已縱跨千古的，使她和謝靈運之間，扯起了一絲神思邈逸的友誼，因此，在主客觀條件的要求下，她欣然接受了執筆的任務。

連雅堂，「臺灣通史」的作者，臺灣新舊文學變革期的主要人物，也是她的外祖父。今年，中央黨部爲了配合光復節慶典，計劃爲對開發臺灣政經文化有貢獻的人士，出版一系列傳記，以表彰氣節、勉勵後人。連雅堂事蹟部份，便力邀由她撰寫。一份血親的深情，一份書香的遺傳，豈不會使她動心？早在大學時期，她已在師友的鼓勵下，寫過一篇連雅堂的小傳，日夜也希望將它理寫完善。因此，在非她莫屬，衆望所歸的力量下，她就接下了這件工作。

謝靈運、連雅堂，一個是古人，一個是今人，一個是六朝的狂放公子，一個是民國的煦煦尊長。此中不僅是形象、身份的不同，更有取材、角度的差異。

「第一個是資料來源很不相同」，她說。

「要瞭解古人，基本上只有正史的列傳可稽考。還有中國特有的大量筆記、小說、佚史可以參酌，但其中捕風捉影者亦所在多有，剪裁引用要格外小心。這些記載又有個共同缺點，不是太簡略就是很蕪雜，時間、地點以及有關人物交代並不清楚。」

「不過針對文學家的研究，又有個好處，就是直接向他的作品中搜尋。輯出發生在他周圍的小事件，觀察他的反應，分析他的性格。也許在個別的作品中，作家會有所隱瞞、矯情，但長編累帙地排列起來，作家個性的幾個特色，還是會浮凸出來，也成為我寫傳時，最主要發揮的憑據。」

可惜的是，中國古典作家對私生活都甚少提及，尤其對兩性之間，家牆內院裏的問題，甚至採取迴避的態度，對欲窺全貌的傳記而言，不能不說是嚴重的缺憾。

「對於連雅堂的採訪就容易得多。年代近，各種書面的記錄流傳得多，亡失的少。又由於他是我的外祖父，我更可以得到不少的方便。（雖然我在記憶中，並未能深入地刻劃下他的音容，因為我四歲時，他便故世了。）我還可以從尊長親友處，打探到許多不

為外人知的消息，在擬寫大綱的時候，我甚至手提着錄音機，走訪耄耋宿學，去挖掘他們與我外祖父往還的記憶。」

因此，佐證這本傳記的參考真是洋洋大觀，有機關檔案、有私人書信、有公開的文章、有輾轉的傳言……，倒真可以銜接歷史，襯應公私了。不過有一利就有一弊，傳記寫作要動人，節奏就要快，必須有一點辣手著文章，剪裁刪減的狠心。

「謝和連變成了兩個完全相反的個案。對謝，我經常要咀嚼一小片材料，而吐出一大片對他的素描。對外祖父則相反，譬如我覺得他和他創辦的雜誌『臺灣詩薈』之間，可以寫出一大篇東西，去探索當時的新聞檢查、思想路線……等等，可是為了全書的比例，我只能寫成『斯文未類賴詩薈』這麼一節。又如『詩界當初唱革新』一節，事實上也可以擴充為研究臺灣新文學變遷的一本書。」

對寫傳者筆鋒的另外一個大影響，就是作者心理上的好惡與主客觀角度不同的問題。

譬如謝靈運狂傲不遜，幾度踏上宦途，又幾度掛官求去，應對乖違，心機難測。一個相同恃才傲物的

人，可能會推許他才高詞盛，故不見容於世俗。但一個老成持重的人，就可能批評他行徑荒唐，難怪乎自招殺身之禍。

對一個距今已遠，毫不相干的陌生人，還有這樣大差異的看法，何況對一個自己的血親、近親，是否常會有隱惡揚善的情緒湧上心頭，有欲加以庇護的困擾呢？

她似乎早已將這個問題，詢問過自己千百次，竟然不必運用任何梳理髮絲等動作，來帶給她一些思考的餘隙。這個緊迫逼人的問題，被她嫺熟而迅捷的回答，輕鬆地化解了。

「作傳，要完全的客觀，似乎是不可能的。人人都有屬於自己，非常個別的價值判斷，好惡憎愛。褒貶抑揚，是很難統一的。」

「至於我，我把『人性』和『同情』，作為我觀察事物的兩個方針。」

「人性，是多樣的，是很難完美的。我不願完全刻劃個人超越凡俗的一面，塑造一個矯揉似偽的假聖人。我也願意發掘他感性、軟弱的一面，不是去為了翻案污蔑，而是找到他人性裏的親切。同樣的，我也

不願尖銳地，強調一個人的缺點，因為缺陷是人類共有的，我們應該同情缺陷的傷痛，和祈求它的痊癒。

「譬如我的外祖父，在他中年的時候，很長的一段時間，與一位家庭以外的女性維持着一份很真摯的友誼。這段往事，我的母親輩們，曾力勸我不要寫出來，可是我覺得，如果我們能瞭解，這是一個人性中不算缺陷的缺陷，能同情一個詩人的心田需要友誼的滋潤，豈不也是一個很美的事情嗎？所以我並沒有加以隱瞞，還是把這一段悽艷而無可奈何的插曲，交代了出來。」

「其實，寫作傳記，在我看來，也並不是記述某一個人物一生的流水帳而已，却應該要有一個重點，一個中心。傳記和小說的最大不同點在於：前者是以一個真實存在過的人物為主角，後者則往往是以一個虛構或抽象化的人物為主角；但是某一人物之值得我們去記述他，必定有其原因。所以在寫作其傳時，也應當把握住這一點，引導讀者去接觸這一個方向才對，否則便會成為一本散漫沒有主旨的書，或者也可以說：變成了散文化的年譜。」

沒有自己的原則，作傳的取捨就容易偏頗。難怪

自古及今，中國爲先人通行的體制不斷，而稍一不慎，便容易被入攻擊爲「誤墓文」，好的行狀真是不多見呢。

一篇傳記，從執筆到付印，從被創作到被欣賞，不能不算是一段漫長的路程。

作爲一個傳記的讀者，她覺得倒不必過份拘泥於文章中的觀點，有時，也可以把書中敘記的史實，析離取下，自己作一番咀嚼消化，也許可以得到另一個輪廓的看法。當然對於原作者整理與分析的苦心，也不能不存着一份尊重的心理。

作爲一個傳記的作者，她覺得從寫作中已經得到了樂趣。每當她執筆時，她會深深陷入自己正在刻劃的那個世界，會馳騁在往日的時光裏，與她書中的角色一同遊憩，甚至於藉傳中人物的眼光去看人生看世相。遇有不平，她的筆尖會不自覺地深深鏤刻進稿紙裏，藉以勉力平復那激盪在她胸腔裏的熱血；遇有歡欣，她的筆尖又不由自主，在稿紙面上輕飛曼舞，笑容會悄悄地偷襲上她的雙頰。

「這真是一件容易上癮的工作！相信像詩，像散文，或小說，傳記寫多了，經驗的累積也會帶來進步的。」

可是，可是她却無法考慮在最近的將來，再從事其他的傳記寫作。

「因爲時間太稀少，因爲資料的收集與瞭解太困難！」

寫傳，不僅是需要徵信的資料，更需要與傳中人物長時間心靈上的溝通。

「除此一人外，對其他的人，我目前無能爲力！」也許，還要再過若干年後，我們才能得到她又願意執筆寫傳，令人興奮的消息吧？

談話已近尾聲，氣氛變得愈加輕鬆起來，我們關掉了錄音機，品着茶，閒聊着。

傳記，在整個文學的範疇，當然只佔據着一小部份，但却是非常具有趣味的一部份，因爲它記載着，與我們一樣有血有肉的人，給我們「舜何人也？」「有爲者亦若是！」的衝動。

傳記，這個體制，在中國不能說不老，但發達的却只有兩個系統，一個是與政治息息相關的正史；一個是讚述先祖的家傳。比較文學性的傳記，用歷史片段、文學手段的傳記却不多見。

爲什麼呢？這個問題也許最好留給聰明的讀者，您來思考吧！